

團體分析做為質性資料分析的基礎： 客觀詮釋學及其序列分析原則

陳登翔

109

團體分析做為質性資料分析的基礎

感謝齊偉先老師對於本文長期的指導與Dr. Thomas Loer在理論上的協助。感謝廖培珊主編、編委會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寶貴建議，以及學刊助理編輯陳家平的細心校對。

※收稿日期：2024.04.17 接受刊登：2024.07.30

陳登翔(✉)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通訊地址：840401高雄縣大樹區興田里興田路153號
Email: kb8mj23@gmail.com

摘 要

由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Oevermann開創的客觀詮釋學(Objective Hermeneutics)，與基於該方法論所建立的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其研究方法特色是要求以團體分析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此方法要求團體成員在遵守序列分析原則的狀況下進行討論，以此避免分析者的主觀見解，構成分析的客觀性。然而，該方法論對於分析過程的指引，在實際團體分析執行時，仍受團體成員間互動而造就的不確定因素影響。以此，本文首先說明客觀詮釋學的分析團體運作模式(延展性原則、節省性原則)，及其理論基礎，然後探討團體分析實際操作可能遇到的困難，檢討實際運作與客觀詮釋學分析原則之間的差距。

關鍵詞：客觀詮釋學、序列分析、團體分析、質性研究

Group Analysis as the Foundation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Objectivist Hermeneutics and Sequence Analysis Principles

Teng-Hsiang Chen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Objective Hermeneutics, a methodology pioneered by the German sociologist Ulrich Oevermann, and the Sequence Analysis process based on this methodology, require data analysis in a group format. The approach entails the engagement of group members in discussions that adhere to Sequence Analysis principles, which supports the dual purposes of mitigating the subjective inclinations of analysts and achieving analytical objectivity. However, when following the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s of Sequence Analysis, interactions among group members can create uncertainties that require careful discussi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e operational modality of Objective Hermeneutic analysis, principles of extensivity and parsimony, and their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It then examines the various challenges that might be encountered during the group analysis process due to its focus on the disjunction betwee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nd the foundational tenets of Objective Hermeneutics.

Keywords: Objective Hermeneutics, Sequence Analysis, group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一、前言

2014年第九屆柏林研究方法論壇(9. Berliner Methodentreffen)，舉辦了一場主題為「研究工作坊」(forschungswerkstätten)的場次。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要研究方式的社會學教授們，一同探討詮釋與分析團體(interpretations- und analysegruppen)的運作模式，並分享自身在分析團體的運作中，有關分析的經驗與觀點(Allert et al. 2014: 291-316)。該論壇嘗試重新探討以團體方式進行研究與分析的運作，同時也指出Ulrich Oevermann所創立的客觀詮釋學(Objective Hermeneutik)，與依據其方法論基礎所發展出的序列分析(Sequenzanalyse)，在團體分析的論戰上有重要的地位。客觀詮釋學所建立的序列分析原則，界定出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分析步驟，指出對於客觀意義的理解，也有助於理解社會現象；此外，這個原則也要求以團體討論方式，確立文本分析的有效性，展現了客觀詮釋學在方法論上的貢獻(Flick 2007 [1995])。以分析團體的方式對質性研究資料進行分析，是德國學界常見的研究過程，其認為資料分析過程，不應由個人單獨執行，而強調應由一群人共同參與分析。學界較熟知的紮根理論，其最大特徵即是針對訪談稿進行編碼(參閱徐宗國 2008；藍佩嘉 2015)；而客觀詮釋學的特徵是以分析團體進行研究，並設定團體分析原則的方法論，更顯示客觀詮釋學在眾多方法中的獨特性。¹

自1980年代以來，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在德國社會學領域逐漸散播開來。在德國，已有許多學者依照客觀詮釋學的

1 1960年代，德國學界逐漸認識在美國由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與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所展開的新一波研究取徑；同時，1970年代德國興起一波檢討量化研究的風潮，除了思考美國質性研究在德國的應用外，也反思起德國發展質性研究方法的可能，直至Fritz Schütze的敘說訪談法(Narrative Interview)和Ulrich Oevermann客觀詮釋學的出現，才終於讓德國不再只能應用美國引進的分析方法。上述脈絡，是客觀詮釋學對德國學界而言的另一重要性(Flick 2007 [1995])。

方法論要求，並且運用由該方法論所開創出的序列分析進行研究，該方法論也逐漸拓展至奧地利與瑞士。² 介紹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的相關書籍與文獻已逐漸增加（Wernet 2009; Ley 2010），英文的質性研究教科書與文獻，也開始介紹該方法論與研究方法（Flick 2014; Franzmann 2022; Wernet 2014）。而專門介紹 Oevermann 理論概念與介紹客觀詮釋學派的專書也相繼問世（Becker-Lenz et al. eds. 2016; Garz and Raven 2015），臺灣學界也已有一本專書（黃聖哲 2018）。但是，上述介紹序列分析執行方式的相關文獻，只專注在原則的分析，鮮少強調其執行是以團體分析的方式進行為前提，倘若只是閱讀有關該研究方法的文獻，便會感到難以學習與應用。這也說明，在創造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的學術環境中，以團體進行分析的研究過程較為普遍，也似乎把團體分析視為理所當然的分析程序，導致文獻上較少提及分析團體運作的內容。³

以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於客觀詮釋學的團體分析模式進行探討。本文首先說明客觀詮釋學的團體分析程序；其次介紹客觀詮釋學將互動做為分析基礎的學理觀點；第四部分說明團體分析執行的過程，與實際執行時可能遭遇到的困難；最終，檢討客觀詮釋學以團體分析所欲達到的分析結果，其方法論觀點與實際運作的差距。在闡述過程中，也介紹團體分析實際運作的情形，做為說明客觀詮釋學團體分析內容的補充。本文嘗試在實作的面向上檢討其方法論的原則，期待透過本文對於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的介紹，能為臺灣社會學質性研究分析方法提供另一方法與觀點，並展開新的資料分析視野。

2 下列學會網站明確標示出目前歐洲各國運用客觀詮釋學進行研究的學者。請參閱網站：<https://www.agoh.de/standorte.html>。

3 根據 Reichertz（2013: 43-44）對於紮根理論的介紹，創始者 Anselm Strauss 在執行分析時，也是以團體分析的方式進行。另可參閱 Wiener（2007）介紹以團體分析方式執行紮根理論的文章。

二、客觀詮釋學的分析團體

團體討論的基本特徵，即是能夠獲取團體成員多方的意見，透過多元的視角提高理解實踐的品質。以團體討論進行分析的研究方式，在 1950 年代的德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就已經開始進行（Reichertz 2013: 13-20）。經過多年的發展，團體討論不僅僅只是一群人一起討論，而是基於不同的學理基礎，從團體討論的程序（gruppendiskussionsverfahren），成為依據方法論基礎執行的分析團體（interpretationsgruppen）。Reichertz（Allert et al. 2014; Reichertz 2013）概略地將德國學界分成三個學術傳統：首先是受到紮根理論創立者 Anselm Strauss 所影響的 Bielefelder/Kassler 傳統（主要學者是 Fritz Schütze 與 Gerhard Riemann）。該傳統認為，分析團體的任務是要運用各種觀點分析資料，認為分析過程中加入各種不同的觀點，能提升研究結果的品質。其次是心理學家 Alfred Lorenzer 和社會學家 Ulrich Oevermann 的論戰。前者認為團體分析即是運用團體的主觀性對資料進行分析，分析的材料對於成員所造成的主體性反應，也屬於分析資料的一部分，必須進行分析。後者則反對前者對團體主觀性的重視，認為客觀性才是團體分析所應追求的目標，並且強調分析不應追求大量的觀點，而是追求即便是由不同背景成員所組成的團體，都能依據分析原則而構成客觀性。最後是 Thomas Leithäuser 心理學領域所使用的團體分析，指出分析應關注分析材料如何影響團體成員的主觀感受。

由此可知，以團體討論對資料進行詮釋的方式，並非客觀詮釋學獨創，而是各種分析方法都能以團體方式進行，即便不採用某種特定的質性分析方法，仍然可以與他人共同討論分析材料。但在各種分析團體的分析操作過程中，客觀詮釋學的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徵是制定出嚴謹的團體分析過程（Flick 2007

[1995])。客觀詮釋學所指的客觀，是指分析必須要超越個人主觀的觀點，要求團體成員在遵守分析原則的狀況下進行分析，在過程中尋求團體成員對於文本詮釋的共識，以此構成分析的客觀性。

在實際執行的分析原則上，Oevermann (2000: 100-104) 強調整體性原則 (totalitätsprinzip) 與字面義原則 (wörtlichkeitsprinzip)。整體性原則分為資料的蒐集和分析兩部分：在資料的蒐集部分，強調研究者要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將所能蒐集到的各種細節都記錄下來，如此才能在分析時盡可能地重建個案的行動序列與所處的脈絡，由此獲得其整體性。在資料分析的部分，則要求分析者在分析過程必須保持文本的完整性，不得任意擷取文本的片段進行分析。字面義原則是要求分析者只能針對文本本身——所有被記錄下來的語言與非語言——進行分析，其研究範疇僅限於被文本記錄下來的感官特徵，不得以文本相容性任意猜想文本中未出現的要素。

客觀詮釋學要求以團體討論的方式進行，其所強調的分析原則，是所有分析團體成員所應共同遵守的規則，而制定的原則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漸被更仔細地描寫。Wernet (2009) 更細緻地歸結出序列分析的五項分析原則：(1) 序列性 (sequenzialität)，是序列分析最重要的原則，要求分析的進行必須嚴格跟隨文本被記錄的過程；(2) 去脈絡性 (kontextfreiheit)，要求必須直接針對文本本身進行分析，避免在分析之初，就使用脈絡對文本進行詮釋；(3) 字面義 (wörtlichkeit)，要求必須對文本字斟句酌地詮釋，即使個案的陳述有誤，仍必須對其錯誤進行詮釋；(4) 延展性 (extensivität)，意指分析的同時，要想像並盡可能地窮盡行動的可能性；(5) 節省性 (sparsamkeit)，從眾多的行動可能性中，針對行動者所挑選的行動之客觀意涵進行詮釋。

成員對於這五項原則的遵守，都是由分析團體帶領者進行管控，帶領者通常是熟悉此研究方法的學者們；將資料帶進分析團體的研究者，則不一定熟悉序列分析。對於這些研究者而言，自己帶來的分析材料在進入團體分析時，就是進入一套分析程序，等待分析的結果。由於去脈絡性原則的要求，成員在分析時必須要先面對文本，所以提供材料的研究者，只有在分析一個完整的序列段落後，需要提供脈絡資料時，才會被詢問相關的資訊。依筆者經驗，實際的團體分析運作可分為三個步驟來理解：首先，針對一段互動內容進行分析，成員要遵守序列性、字面義、去脈絡性，此三項原則；第二步驟，即是延展性原則的環節，開始描繪其他行動的可能及其客觀意義；最後進入節省性原則的步驟，以這些其他可能行動的客觀意義為基礎，對個案具體的行動進行詮釋。如此，則完成一次一個互動內容的分析環節，然後再進入下一個互動內容進行分析，如此不斷重複，直到文本全部分析完畢。並且依據序列性原則，不會在分析的過程中，任意地將分析焦點在文本裡游移，所以每個段落只會被分析一次。整體而言，序列性、字面義、去脈絡性，此三項原則是全程都需要遵守的原則，而延展性與節省性是團體分析的過程。

從 Oevermann 到 Wernet 所描繪的分析原則，並不是對於應遵守之準則進行擴充，也不是某些準則以前不被重視，而現在需要被清楚規定。事實上，正如 Flick (2014: 456) 所指出，序列分析的執行就如同藝術作品的製作過程，需要實際參與操作，才能清楚分析其運作模式，研究者很難在閱讀序列分析內容之後就可以執行，這是該方法被認為最主要的限制之一。因此，Wernet (2009) 明確寫出五種原則的做法，雖然看似簡化了原本 Oevermann 的理論體系與序列分析的操作方法，但從該研究方法的使用者角度來看，Wernet 的五項序列分析原則，有利於團體成員在分析時，有更具體的原則可以遵循。

整體而言，Oevermann 強調研究的執行應立基於方法的理解（methodische verstehen）而非實踐的理解（praktische verstehen）。實踐的理解就如同日常生活中必要內省的精神運作，是哲學詮釋學的研究題材，但是此種理解容易產生誤解，而且在方法上也無法進行有效性的檢測。方法的理解強調的是對於材料進行分析，並且能夠進行有效性的檢驗（Oevermann 2008: 146）。客觀詮釋學透過序列分析原則與以團體進行分析的要求，塑造以研究方法理解現象的操作過程。當研究者將文本帶至分析團體時，團體成員依據分析原則，進入分析與理解該文本的過程當中，也因此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於研究者預測的分析結果。⁴

三、互動序列做為分析的基礎

1970 年代 Ulrich Oevermann 執行有關家庭互動的研究，隨著科技的進步，訪談員從手寫筆記、錄音與攝影，逐步地詳細記錄家庭內的互動。在這當中，如何分析大量成員互動記錄便成為了一道難題；在現有的重要資料中，如何透過分析而能結構性地掌握某種現象，並同時展現個案的特殊性，遂成為分析資料的重點（Franzmann 2022: 172）。Oevermann 也就以探究家庭成員的互動，做為他後續逐步構築客觀詮釋學與序列分析的起點（Flick 2014: 452）。

客觀詮釋學的「序列」概念，指的是事件發生的順序，而非因果關係，互動序列所指的是互動過程具體內容的發生順序。Oevermann 將互動規則類比為數學的演算法，認為互動的過程是所有參與者共同進入一個互動的規則之內，因此，互動被假定為由其潛在的社會行動規則所創發。互動應被視為一個整體，而不

4 Oevermann (1996) 在將分析貝克特的劇作《終局》（*Endspiel*）做為說明序列分析的案例時，也提到經過序列分析出來的結果，和他本人的預期不同。

是單個行動的組合；單個行動是互動的抽象形式，仍必須放在互動的架構下分析（Oevermann 1999: 78）。但此規則並非僵化，每當互動參與者決定要產生何種具體行動，規則將可能隨之改變。就如 Mead（1962 [1934]: 177）論及的「主我」（I）具有自由且創新的特性，在互動過程中的每個序列節點，個體該節點所做出的反應，都有可能導致互動所依循的規則內容有所改變，同時也開啟互動內容的多樣性。Oevermann 將行動者的行動指稱為「生活實踐」（*lebenspraxis*），強調在各種行動規則的可能性之中，行動主體實際上挑選了某一行動，也就是該個體所做出的「決定」（*entscheidung*）。然而，此種決定並非如韋伯的工具理性或理性選擇理論所假設的那樣，是人們在做決定之前精密計算的結果（Weber 2005: 17）。因為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許多決定並非經過有意識的思考，因此，我們無法假設個體先有主觀的決定，然後才進行互動。

意義發生的規則（*bedeutungserzeugende regel*），與行動者在此規則中實踐具體行動內容時的決定，被 Oevermann（1995）視為探討日常生活實踐序列的兩項基本參數，這是分析生活實踐的方法，也構成客觀詮釋學在論述與分析現象時的主要架構。規則就如同演算法的運作，是各種合乎意義邏輯可能的連接（Oevermann 1995: 41）；而社會也已經對各種規則的路徑賦予既定的意涵，並非純粹的中性。在此架構下，行動者進行互動之前，有關該情境中互動所具有的條件與規則，以及所包含的社會意義，皆已存在。

個人具體生活實踐的決定，是各種行動要素的總和，包含一般社會學所指稱的動機、觀點、世界觀、心態、個人價值和個人習慣所展現出來的形式（Oevermann 2000: 65）。在此規則與生活實踐決定的觀點下，個人所採取的互動行為，既非個人行動間的相互對接，也非自己依據對方的期待而做出的回應，而是由

規則所導引的行動 (regelgeleitete handeln) (Oevermann 1995: 43)。Oevermann (1995: 75) 認為，無論是個人在互動中，自我與他者間的相互詮釋與預測，⁵ 或是互動雙方在各種不確定性中努力使彼此觀點交疊的試探，⁶ 都必須以既存的相互性規則為基礎，而實際的互動便是此種相互性結構的展現。

規則是在互動序列節點的決定中沿襲或被創造，因此規則並非靜態與固定不變。大多個案做出的選擇，往往已被社會規範、標準化，或僅僅是生活的常規所預先決定。我們無法認定個案是有意識地選擇了該行動，而只能預先假設個案的行動可能是有意識地選擇，或可能只是依循個人慣習、日常生活常規或社會規範，但這同時也構成個體實踐的多樣性 (Oevermann 1999: 80)。無法確定的是，行動者是否知覺到自身所能執行的各種行動，並在該情況下挑選了某一具體行動？因此，無論是行動者主觀或無意識下的選擇，行動本身都展現出眾多互動可能性規則的其中一種，並且在互動的強制性下，行動是被要求立即挑選和執行的。⁷ 行動者做出的反應，更有可能是依循社會規範或是個體的慣習 (habitus) 而來，這也代表各種行動被挑選的機率並非相等，在一般情況下，某些行動會被行動者優先挑選，互動者間的行動，會被彼此的相互性所導引。而執行分析的重點，就是把這些個體決定的節點，重新建構出來，做為理解情境中各種實踐的基準。

5 Oevermann 所談到有關互動中自我與他者間的相互詮釋與預測，指的是 Habermas (1981: 28-29) 討論自我與他者間錯誤的相互預測，導致失敗的溝通，但同時可能造成一個新的互動規則；這部分的討論也可參考互動過程中角色取替能力的運用 (role-taking) 的論述 (Geulen 1982: 53-54)。

6 Oevermann 在此指的是 Parsons 與 Luhmann 談論的雙重偶連性 (doppelte kontingenz)。可參閱 Parsons (1962: 16) 與 Luhmann (1984: 156)。

7 Kieserling (1999: 67) 在系統理論的背景下，將互動定義為「此時此地的溝通」 (kommunikation unter anwesenheit)，互動者皆在場並可以相互感知，強調互動的在場性 (anwesenheit) 的同時，也指出互動相對於寫信、互相傳訊息等書寫溝通的方式，擁有較少的反思空間 (請參閱 Maiwald and Sürig 2018: 14-17)。

客觀詮釋學強調行動的序列，並也因此將其發展出的研究方法稱之為序列分析（Sequenzanalyse）。分析過程中的序列性原則，是成員最要遵守的原則，其主要內容是來自於客觀詮釋學吸取了 Mead（1962 [1934]: 77-78）對於行動的順序與意義的論述，即「意義的機制在社會行動中出現。第二個機體的行動或調整的反應，會給予第一個機體的姿勢所具有的意義。」因此，在探討互動客觀意義的實際分析上，必須依照互動的發生順序進行分析，將行動置於整個互動序列過程，及所有行動的可能性之中進行詮釋。互動發生的先後順序必須被清楚地記錄，過程中詞句與手勢的使用、口語音調、眼神等非語言的溝通都需要被記錄下來，然後才開始進行分析。分析過程中，也必須照著已被記錄下的行動序列，不可將文本依照研究者的意願「只把重要的零件拆卸（auszuschlachten）」（Wernet 2009: 27）。因此，研究者被要求只能照著互動的序列進行分析，不可在文本之中來回遊走，也不可只挑選研究者認為重要的部分進行詮釋（Wernet 2009: 28）。客觀詮釋學緊貼著文本的序列進行分析的要求，使分析者可以理解個案實踐的過程如何逐步產生意義，並對於個案主觀意義與實踐的社會客觀意義進行比較與分析。

然而，序列性原則是最難遵守的原則。分析過程要求成員不得破壞文本的序列，也不能在文本之間遊走，但例如在分析訪談稿的過程時，當需要分析有關「個案為什麼這麼說？」或「個案為什麼這麼想？」的時候，成員會直覺地翻閱到後續的訪談中尋找答案。此種做法忽略了正在被分析的行動序列，也誤認了個案的說法就是分析所追尋的結果，容易使分析淪為僅僅是尋找研究者想要的答案。此外，分析時不應預設行動者有完整的思考體系，並且依此體系做出所有的行動。客觀詮釋學認為，行動者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未必是經過思考的，而且經常是跟隨由相互性所導引的互動規則，以及情境所造成的強制性而產生的行動。也

因此，遵守序列性原則的要求，除了強調行動者經驗到的情境與決策過程也具有序列性之外，也強調成員要跟隨所經驗到的情境與決策的過程進行分析，同時在分析過程中，萃取出該情境中相互性所導引的互動規則。

Oevermann 認為分析不只應追求個案主體的觀點，而是要分析出個案行動的客觀意義。他延續了 Mead (1962 [1934]: 75-76) 對於「意義」(meaning) 的論述，即意義是在行動與行動之間的範圍內產生，而單個行動的意義是由下一個行動所界定。Oevermann 認為 Weber (2005: 4) 在強調經驗和意義關聯——即主觀意義關聯 (gemeinter sinnzusammenhang) 和情感關聯 (gefühlsszusammenhang)——時，忽略了客觀意義的作用 (Oevermann 2000: 68)，而正是這些客觀意義的作用構成了互動規則，並在具體的互動中展現出來。這也使得客觀詮釋學專注於分析行動者具體的互動，並重建出其客觀意義結構的作用，被稱為「潛在的意義結構」(latente sinnstruktur)。以分析逐字稿為例，則是強調理解個案陳述內容之外，也要理解其陳述內容的客觀意涵。

Oevermann (2002: 6) 認為社會科學主要研究的是看不到的抽象事物，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有著極大的不同。做為經驗科學研究者，我們所看到的是來自意義建構世界 (die sinnstrukturierte welt) 的心理、社會與文化的具體現象，研究者也在此世界中具體化自身的生活實踐。基於這樣的建構論前提，我們得以理解具體行動所構成的抽象意義。行動與行動之間所構築的意義，具有其客觀性，因此行動者依據互動規則所做出具體實踐的客觀意義，也能夠透過分析被理解。簡言之，客觀詮釋學要求分析必須以團體討論的方式進行，主要在於尋求成員分析個案行動客觀意義的共識。

四、序列分析團體的原則與實作

有關以團體進行分析的要求，在介紹序列分析的文獻中皆有提及（Flick 2014；Kleemann et al. 2009；Wernet 2009, 2014；黃聖哲 2018），但多數卻著重說明分析團體成員所應遵守的分析原則，甚少介紹或討論到分析團體的運作狀況，如成員的組成或執行分析的次數。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介紹團體分析運作過程，補充介紹序列分析文獻的不足，也以實際運作模式對方法論進行反思。

（一）成員構成的基礎

以團體進行分析，最直接的提問就是：團體之中應該要有幾位成員？成員需要什麼樣的學術背景？針對這兩個有關實際執行狀況的提問，客觀詮釋學沒有給出量化式的回答，而是根據客觀詮釋學的觀點，認為分析團體中成員之間的相互論辯，是分析時最重要的核心，必須保持各種分析、各種可能性的討論狀態。同時，分析團體首要關心的不是成員人數，而是團體的成員是否有一定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訓練背景、語言的敏感度和邏輯思考能力。僅有心智尚未成熟，與無法承受分析過程的人員應該被排除，並且希望團體成員的整體經驗能夠盡可能地多元豐富，這將有助於設想文本內容的其他可能性。成員須在心態上已經準備好加入團體中的系統性的爭論（Oevermann et al. 1976: 393）。

在成員學術背景的部分，客觀詮釋學認為詮釋的有效性，是立基於分析團體遵循序列分析的程序，而不是透過成員的個人經驗，或是團體內的多數意見所保證。成員的特殊性會被團體分析過程所掌控與平衡（Oevermann et al. 1979: 393）。即便不同成員各有著不同的經驗與學科訓練背景，但對於分析的結果並不會

帶來影響，因為分析的有效性並不是來自團體成員本身，也不是成員對於文本內容的知識，或是對於生活世界的熟悉程度。簡言之，成員的背景提供的僅僅是分析過程詮釋的各種可能性（Wernet 2009: 14）。

針對人數和成員背景的提問，客觀詮釋學並沒有數據式的答案，但在實際的操作上，就以「團體」一詞而言，已經預設了要三人以上。在沒有要求或建議人數的狀況下，當成員人數過多時，討論的狀態經常只局限於團體帶領人和幾位成員的對談，因此團體分析，非常要求成員的投入，才能達成以成員共識為基礎的客觀性分析。針對成員的背景，客觀詮釋學認為成員受過人文科學的訓練即可，但實際情況則是，不清楚客觀詮釋學分析原則的成員，經常在過程中針對分析原則進行提問，而團體帶領者經常要花費時間重複說明分析原則，這經常導致分析的中斷，同時也增加分析的整體時間。因此，即便學理上並沒有強調，但為了讓團體分析所進行的論辯更能夠聚焦，成員對序列分析原則也需具備一定程度的瞭解，甚至學習過客觀詮釋學和序列分析。

Reichertz（2013: 29）指出干擾團體進行的成員（querulant）是團體分析最大的缺點，但 Reichertz 並沒有描繪此種成員的特徵。事實上，團體中經常會出現不斷質疑分析過程與結論的成員，或長時間陳述個人意見與經驗。Allert 則認為，此種成員能夠刺激其他成員的思考，並提升分析的多樣性（Allert et al. 2014: 301）。成員個人的經驗是有助於拓展分析視野的案例，可與正在分析的文本段落進行對比，但也會有成員不斷分享自己的意見與抒發情感，直接影響到分析的走向。此種成員通常對於序列分析原則並不熟悉，需要團體帶領者特別對他說明分析原則，而這經常也是導致團體分析時間過長的主要原因。

團體帶領者是團體分析最重要的角色。紮根理論創立者

Anselm Strauss 在帶領團體分析時，認為帶領人最重要的是提供成員一個考驗自己想法的自由空間，使成員敢於嘗試各種不同想法，成員在參加分析團體時，能夠感受到平衡的關係狀態，帶領者實際上是扮演主持人的角色（請參閱 Reichertz 2013: 43-44）。在分析團體中有帶領者、分析者（將分析材料帶至分析團體的人）、模仿訪談者與受訪者的成員、一般參與的成員等四到五個主要角色。其中，團體帶領者的角色尤為重要，他要掌握分析的進度、團體內的氣氛、對於分析進行提問、提出質疑，確保分析過程符合序列分析的原則，也因此經常是教授或老師擔任之，但也會出現直接或間接對於成員較強烈的糾正與指責，影響團體運作的氛圍（Reichertz 2013: 29-30）。

（二）序列分析的運作與干擾元素

一般而言，分析團體內需有一位帶領者，負責確保成員在分析過程遵守序列分析的原則，並逐步推進分析進度。研究者負責將分析材料帶至團體中，他通常不會是帶領者，其主要任務是在分析開始前，說明該研究的動機與問題。分析的文本如果是訪談稿，其內容是訪談者與受訪者的問答記錄，則可以另外安排兩位成員模擬當時的訪談狀況，將有利於分析音調、眼神、身體姿勢等非口語表達的部分。分析一開始會由研究者介紹研究問題，說明帶來的分析材料。模擬訪談情境開始後，會由帶領者指示停止模擬，通常會在文本中一句話（出現句號時停止），或是一個互動完結時停止，然後進行分析。

客觀詮釋學的「客觀」是基於成員間的論辯過程中，尋求行動結構規則的共識所構成，透過成員間思考的激盪與互相討論、辯論，勾勒出分析片段的各種可能性，與歸結出個案具體實踐的社會意涵，也據此構成分析的有效性。其具體的執行過程是先進

行延展性原則，然後再進行節省性原則。延展性原則，是對於分析的段落描繪其所有可能的行動序列，如同腦力激盪一般，窮盡在該互動情境下所有可能的行動。這時，以團體進行分析的優勢便從中展現出來，因為成員們會不斷地提出行動的各種可能，或想像最一般到最極端的行動內容，然後探討各種內容的社會意涵(Wernet 2009: 32-38)。隨後進入節省性的步驟，在已經列出的各種互動可能性之中，對於行動者所挑選的具體行動進行詮釋。概括而言，從延展性原則到節省性原則，類似於一開一合的分析過程，以個案具體的實踐做為基礎，透過團體成員的腦力激盪窮盡行動的可能，再以各種行動的社會客觀意義為基準，歸結出個案具體實踐的社會意涵與意義。此過程如以團體方式進行，除了更能夠窮盡行動的各種可能性之外，透過成員間的辯論，也確立其行動的社會客觀意義。同時，在對於行動的客觀意涵進行詮釋所產生的辯論，也碰觸到個案行動本身，以及分析團體成員所乘載的文化意涵，進一步地開展其他延伸的討論議題。

在執行節省性原則的過程中，成員間相互對於各自詮釋內容的論辯是持續發生的(Kleemann et al. 2009: 124)。針對此過程，在有關該方法論的介紹專書或是研究文獻都甚少提及，會讓人誤以為分析過程是平和順暢的，且成員彼此之間都同意所討論的詮釋內容。實際狀況則是：尋求共識過程需要長時間與高強度的論辯。由於對每一個文本的細節都必須進行論辯，所以要花費大量時間。一般狀況下，只要研究者選取出能夠解釋所要探討現象的有效文本，便能使分析團體順利運作直至分析結束。但仍有以下三種狀況，會導致分析停止與宣告分析失敗：首先，分析過程中發覺該分析文本不屬於該現象，即分析過程無法使成員逐步理解所要探討的現象，這說明研究者蒐集到錯誤的個案。其次，若正在被分析的文本無法有效地展現出探討現象的實際內容，意即文本無法代表其現象，那麼也沒有分析的必要，因為其做為分

析素材的有效性已經喪失。最終，分析文本的結果是否能夠歸結出一個可指涉該文本之概念——即勾勒出行動者的行動邏輯，若該文本的分析無助於我們理解現象，則宣告分析失敗。

參加分析團體的成員，經常會因為不熟悉序列分析原則，而需要帶領者提醒。例如序列性原則強調分析必須緊貼文本的序列，不可隨意提取文本內容，但這卻是成員最容易違反的原則。在分析團體開始之前，研究者會發給成員分析文本，而成員往往隨即開始閱讀文本內容，不依照文本的序列進行分析，而直接翻閱至後面的內容進行論證，違反序列性原則。就以訪談稿分析而言，個案的論述有時會出現前後不盡一致的內容，同樣的提問也會給出不一樣的答案，此時，成員經常會因為已經在分析開始前閱讀完訪談稿，而在分析時急於統整、證明或糾錯個案的說法。直接探看後續的個案論述，破壞了序列性原則，導致分析團體不僅無法隨著個案的論述進行分析，也陷入僅討論哪個陳述才是個案真正想法的爭議中，而忘卻客觀詮釋學追求理解行動客觀意義的基本立場。這時，帶領者就必須制止成員的論述，重新回到原本的分析文本序列。違反字面義原則的狀況也容易發生，該原則要求只能對於被捕捉到的線索進行分析，分析過程專注於「個案說了什麼，而非其實他也許想要這麼說」（Wernet 2014: 241）。實際狀況經常是成員猜想行動者的動機，當成員說出「我覺得他想講的是」、「我認為他的意思是」，就是違反此項原則的前兆，這時帶領者通常會要求成員透過文本內容進行論證，如果成員無法透過文本內容證明其觀點，則會被視為猜想，無須繼續討論。

Reichertz (2013: 29) 指出，只要是以團體進行分析，就可能導致分析的時間過長、團體中有不斷干擾進行的成員、帶領者要思考如何帶領當前的分析團體、並適當發揮自己的功能，這些都是團體分析執行時會面臨的現場狀況與可能的缺點。分析時間過長幾乎是團體分析無法避免的狀況，序列分析在進行延展性原

則時，即對於行動其他的可能性進行想像，通常需要長時間進行；而後續的節省性原則，即確定行動的客觀意義，也需要長時間的討論。然而，為了盡快結束分析過程，而過快地總結其分析出的客觀意涵，忽視了正在爭辯的內容，也被客觀詮釋學視為分析的主要障礙。

五、做為「序列性的分析」新取徑的嘗試及其困難

綜觀而言，許多質性研究分析方法，皆強調分析資料內容的時間發展順序，被歸類於序列性的分析一起進行討論，如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敘述分析（Narrative Analysis）（Flick 2007 [1995]; Maiwald 2005）。各種分析方法有各自的分析面向與目標，Maiwald（2005）將對話分析、客觀詮釋學與知識的詮釋社會學（hermeneutic sociology of knowledge，以下簡稱 HSK）進行比較：對話分析專注於日常生活溝通如何運作，像是對話如何開啟與結束、話輪轉換（turn-taking）的過程，較常運用在研究笑話、講道或八卦的溝通文體（communicative genres）。HSK 強調要理解行動者的主體觀點，行動者的實踐被理解為詮釋的實踐，因而理解其意向性成為分析的首要任務。客觀詮釋學則是在分析具體的行動者實踐中，重建出其行動／互動的規則，並期待挖掘出互動規則的客觀意涵。

客觀詮釋學認為行動者具體做出的行動、說話的方式、姿勢的運用、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模式，包含一個人或一群人對事物進行討論的方式，這些人們所展現出來的各種行動都是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而且個人對於社會真實的主觀知覺，也都必然受到意

義文化系統的框架作用 (Flick 2007 [1995]: 35)。簡言之，人類的行動受到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所以要理解行動者為何產生出該行動，就必須先針對行動本身進行研究，由其具體的「痕跡」出發，如各種文本（互動序列的記錄、訪問的記錄、觀察的記錄、傳記性的文獻、回憶錄等）。因為「社會行動的結構邏輯」是抽象的、無法被感官感知的，只能透過語言性的概念進行抽象的重新建構。所以客觀詮釋學對於潛在意義的追求，是從各種細微的行動要素切入，要求仔細地分析個案的所有行動內容，重視個案的特殊性，並透過分析個案具體的實踐，推導出社會文化的結構。此分析取向，展現在序列分析的字面義原則與去脈絡性原則。

字面義原則在本文前段已有介紹，不再贅述。去脈絡性原則強調的是，避免研究者運用對於脈絡已知的知識進行詮釋，導致文本僅是知識的複製，分析僅僅成為知識的循環。然而，這並非否定脈絡的重要性，而是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對於個案要「先執行一個獨立於脈絡之外的意義解釋」(Wernet 2009: 22)，由此顯現個案自身的特殊性。跟隨互動序列進行分析的方式，可以區分出分析文本與分析脈絡兩種分析途徑。序列分析要求研究者必須先對於文本進行分析，對於文本所處的脈絡要有人工造作的無知 (künstliche naivität)，意即成員必須假設自己對文本脈絡毫無所知，才能對於各種細節進行提問，由此使個案的獨特性凸顯出來，避免其特殊性淹沒在脈絡之中。文本所處的脈絡，是在個案被完整分析後，才需要被納入分析的要素 (Wernet 2009: 23; Ley 2010: 15)。以此互動為例：「媽咪，我什麼時候才有東西可以吃？我好餓。」(Oevermann 1981: 13) 如果遵守去脈絡性原則，會先注意到字詞本身的使用，呈現出這位對著媽媽說話的人，是想要取得食物的人，且關注到那個人缺乏能力與無法取得食物的狀況。

去脈絡性原則即是要避免分析者過早將脈絡納入分析之中。對於上述的例子，如果分析者先關注到互動發生的脈絡，那麼會注意到的是：說話者是六歲的男孩，在全家人吃晚餐的時候說出這樣的陳述，同時桌上已經有麵包、肉片、奶油、番茄，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開動。小男孩只需要塗些東西在自己的麵包上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他還沒開始吃，而是催促著媽媽，問什麼時候才有東西吃。以上的分析中，說話者能否取得食物的能力已被忽略，而僅僅考慮到他為何不願意自己動手取得食物（Wernet 2009: 22）。

序列分析的字面義、去脈絡性原則，再加上序列性原則的要求，展現序列分析認為分析首重文本內容，才能展現個案的特殊性，在團體分析的當下是成員必須遵守的原則。在此要強調的是，去脈絡性原則指的是，分析的第一層次要注重個案的特殊性，但是在分析之後，必須要把個案置回脈絡之中。也就是如何在獲得分析結論之後，再與社會結構進行連結，這考驗研究者本身的學識深度，而這也被詬病為序列分析最難以學習的部分。事實上，在進行延展性原則，成員需要不斷聯想各種行動的可能性時，就已經考驗了分析團體成員個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廣度，但是這部分在介紹序列分析時卻鮮少提到。另外，從分析的結果，到個案現象與社會結構的連結，對於剛接觸序列分析的研究者而言，甚至可以感受到一個跳躍的過程。

以 Wohlrab-Sahr (1999a: 52-53) 研究 Ayse Simit 改變宗教信仰的歷程為例。作者在分析個案家庭狀況時，關注到個案的父親因為共產黨的背景被關押於 Auschwitz 集中營，但由於具有釣魚的專業，得以離開集中營到鎮上工作，在此期間，結識了個案的母親。當訪談問及父母相遇的情況時，個案僅簡要提及父母在結婚之前並無頻繁的聯繫。透過分析注意到，個案描述家庭背景的內容與一般人相同，也就是父親的形象就如同單位主管般管理

家庭，但對於父母相遇的方式，無法提供更多的細節。Wohlrab-Sahr 在執行去脈絡原則之後，把個案置於脈絡之中，針對其父母在結婚之前沒有太多接觸的部分，扣連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在父母結婚之後，個案於 1943 年出生，而 1944 年夏天該鎮的集中營，每日有約兩萬名猶太人被謀殺與焚燒，個案父親在此之前，因為具有釣魚專長而能離開集中營。而組建家庭、具有父親身分，會使自己有繼續存活的正當性，可證明父母並非基於互相愛慕而婚姻，而是以生存為目的的婚姻關係，這也才能解釋其父母在結婚之前為何不常接觸。去脈絡性原則之後的分析程序，是將分析個案置回脈絡之中進行詮釋，這在序列分析的文獻中，似乎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過程，並沒有被詳細闡述。但個案特徵與脈絡的連結，需依賴團體成員的個人學識經驗與歷史背景知識，才能夠在文本分析的反覆推敲之中，將分析的具體內容扣連到社會結構的作用。

另外一個依賴成員學識經驗的部分，則是在延展性原則的步驟。Wohlrab-Sahr (1999a: 54) 分析 Ayse Simit 在個人成長過程中，面對自己的家庭、國家與信仰認同所可能的選擇。作者使用延展性原則對其個案可能的行動進行聯想，歸結出五種可能的選擇：個案比父母親更熱衷於政治、逐漸地淡化自己的政治傾向、加入一個新的共同體組織（天主教教會）、追隨 1968 年學運思潮用以處理自己與父母的關係、在柏林圍牆蓋好之前逃到西柏林。以上五種可能的選擇，是個案在面對自我認同、宗教信仰轉變的可能做法與時刻。最終，Ayse Simit 信仰伊斯蘭教，在 1961 年柏林圍牆蓋好之後逃到西柏林，與土耳其人結婚，並改名為 Rosa Prinz。Wohlrab-Sahr 在文章中呈現此延展性原則的自由聯想過程，要窮盡各種可能的選擇，依賴的是團體成員在討論過程中進行各種論述的嘗試。這也是本文針對團體成員的學術背景，是否影響分析過程與結果的提問：上述五種可能的選擇，

是否會因為成員組成的不同，而構想出更多或更少的選擇？運用序列分析的研究論文，並不會將此步驟寫入文章中，因為此步驟僅是資料分析過程的其中之一，而 Wohlrab-Sahr 在此部分的描述，則是概要地呈現出團體分析在進行延展性原則時，所要進行的分析過程。也因為介紹序列分析的文章，並不會描述這些執行分析的細節，使讀者難以透過文獻窺探團體運作過程，導致研究者在沒有實際體驗的狀況下，難以學習與討論序列分析的執行方式。

Wohlrab-Sahr (1999a) 透過分析 Simit 的改宗 (conversion) 歷程，展現出改變宗教信仰不僅是宗教認同的改變，也是做為個人生命問題的解決方式。在其中包含了斷裂與連續兩個部分：個案以信仰伊斯蘭教的方式，造就出生命的斷裂，試圖讓自己從認同的困境中跳脫出來（自己和父母的共產思想、在奧許維茲出生、父親曾被關入集中營）；改宗卻並非生命的完全斷裂，當訪談問及信仰伊斯蘭教後的改變時，Simit 表示並沒有什麼巨大的改變，只是敬畏與崇拜的那個人換成了神，也清楚地知道神和人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但卻認為其作用是一樣的 (Wohlrab-Sahr 1999a: 60)。Wohlrab-Sahr (1999a: 67) 的分析指出，個案在意識形態層次上產生差異，但結構—慣習層次上 (strukturell-habituelle ebene) 則是保持原有的連續性，即延續自己原本面對政治系統的慣習，用以面對現在的信仰認同，直接以宗教信仰取代原本的政治系統，將神視為統治者。說明個案改變宗教信仰，並非純粹地期待生命產生斷裂並重生，而有以此延續自己慣習的特徵。⁸

序列分析的執行過程，經常會特別注意到個案的主觀意義和客觀條件不一致之處。就如同 Simit 已經改變宗教信仰，卻在主

8 有關該個案分析的介紹也可參閱 Jindra 與 Jindra (2003: 272)。

觀意義上認定並沒有任何轉變時，會在分析時被特別注意，並且進行詮釋。此種類似於對照或是比對的分析技藝，經常在序列分析過程中展現。在遵守分析原則的前提下，比對個案前後陳述的不一致之處、主觀意義和客觀意義的差異，甚或是陳述內容與非語言溝通之間所展現意涵的差異。客觀詮釋學所強調的客觀意義，似乎就是在這種比對的過程中更容易被發掘出來，這也說明為何以腦力激盪方式進行的延展性原則，是序列分析的重要步驟，並且序列分析要求必須以團體進行的原因，因為這些都是盡可能地造就各種比對的條件。但是，尋找重要的分析線索，也依賴著分析者對於該議題、田野領域與訪談內容的敏感度，在哪個文本段落必須讓分析團體停下來，仔細思索和詮釋，考驗著所有團體成員的分析直覺。

在實際經驗序列分析的團體分析過程中，一開始是對文本進行詳細地分析，成員要避免違反分析原則；但是在延展性原則的環節，成員開始自由聯想；以及在去脈絡性原則後，將文本扣連到社會文化脈絡時，極度依賴成員的生活經驗與學識深度。總結而言，客觀詮釋學認為團體分析成員遵守分析原則，則能獲得分析成果，但是，實際上成員的個人條件是否真的對於分析結果毫無影響，是客觀詮釋學需要探究的問題。

六、結語：以分析團體為基礎的序列分析多元應用

在分析材料的層次上，客觀詮釋學認為對真實世界的捕捉，是透過文本的記錄而展現，並被進一步分析（Wernet 2009: 12）。這使得日常生活中的互動，乃至於畫作、建築物與各種事物，都可以透過記錄而成為分析材料，並透過序列分析方法進行

研究 (Reichertz 2010: 290)。對於研究者而言，實際分析的執行步驟，僅僅是將文本帶至分析團體中進行討論，便可獲得一定程度的分析結果。也因此，序列分析更容易運用於各種質性材料，如訪談稿 (Loer 2021)、書信文件 (Jansen 2006)、個人傳記 (Garz 2007)、錄影影像 (Loer 2010)、建築形式 (Schmidtke 2008)、藝術作品本身或藝術品導覽 (黃聖哲 2010)，以及其他口語與非口語的分析材料 (Franzmann et al. eds. 2023)。目前在臺灣主要是碩士論文嘗試運用序列分析法，針對各種主題的訪談稿進行分析 (溫士朋 2021；江珮慈 2014；邱秋雲 2008)。

此外，客觀詮釋學相當適用於生命歷程的相關議題研究。透過序列分析重建行動者的生命決策歷程，挖掘出決策背後的社會規則結構，探索行動者在遭遇到生命節點、迫使做出決定時，如何在眾多可能性之中做出決定，以及如何對自身的決定給予合理的解釋。⁹ 以運用序列分析對宗教議題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學者而言，則主要是探討個人或家族改變宗教信仰歷程的相關議題 (Gärtner 2018, 2022; Wohlrab-Sahr 1999a, 1999b, 1999c)。上述序列分析的實際應用，也同時勾勒出客觀詮釋學發展的兩種趨勢：其一是將客觀詮釋學做為一個理論體系與其他學科領域進行對話 (Allert 2002; Garz and Raven 2017; Twardella 2016)。其二是將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帶到不同的議題與社會現象中，對材料進行序列分析 (Oevermann et al. 1994; Oevermann and Leber 1994)。就具體的社會學次領域而言，較常應用在探討家庭互動 (Oevermann et al. 1979; Maiwald 2018)、教育與教學領域 (Schumann 2019; Pollmanns 2023)，與宗教社會學議題 (Gärtner 2018, 2019, 2022; Gärtner and Ergi 2012)。

序列分析在德國實際的運作方式，則是研究者可以在由

9 這部分牽涉到 Oevermann 的行動理論與宗教社會學的基本觀點，中文部分可參閱黃聖哲 (2016、2023) 的文章。

Ulrich Oevermann 所創辦的文化與社會詮釋研究中心 (IHSK)¹⁰ 的網站上登記時間，然後將自己需要分析的材料，依時間帶至指定的研究室進行分析。訪談稿、觀察記錄都會是分析團體的材料，也包含師生互動的記錄、政治家的演講稿、兒童的畫作、家庭內互動的記錄等。研究者也來自各種不同領域，證明該研究方法具有跨學科的應用性。目前的團體分析，大多由 Oevermann 的弟子們帶領，他們深入瞭解序列分析的原則，可以順利地帶領分析團體運作，並同時也可以扮演重要的分析成員。但如同本文所提到的，序列分析過程一方面依賴成員對於分析原則的熟悉；另一方面，在執行延展性原則時，仰賴團體成員的生命經驗廣度，在去脈絡性原則結束，將分析結要扣連到社會文化脈絡時，則需要倚靠成員的學術深度。本文試圖探討，在學習與使用序列分析時，事實上需要先考量到團體帶領者對於分析原則的掌握程度，還有分析團體成員的個人經驗與學術知識，而這些是客觀詮釋學方法論本身未明確涵蓋的。再者，以團體討論的方式進行分析，已是德國社會科學界文化的一部分，其對於團體運作有一定的基礎；該方法使用於不同文化脈絡時，是否有其困難，則需要進一步探討其方法論學理基礎與實際運作現況之間的差距。

本文介紹客觀詮釋學的基本概念與其所創發出的序列分析，對於臺灣社會科學界的質性研究方法，有三種可能的貢獻與啟發：(1) 運用序列分析時，要求依循研究方法原則，並採用團體論證的方式，透過分析團體成員之間的討論與論辯，挖掘出互動的客觀意涵，也從而建立詮釋上的客觀性。即便是研究者的意見，也會被其他分析團體成員提出論辯，考驗其分析的有效性。因此，經由分析團體所得出的分析結論，避免了研究者主

10 該研究中心的網址為 <https://www.ihs.de>。在臺灣雖然沒有如 Oevermann 所創辦的 IHSK 提供學界進行序列分析的平臺，但筆者仍期待透過對於該方法的介紹，也能夠協助社會科學研究者更順利的進行研究，並期待開拓新的研究視野，做為臺灣社會學者們執行質性研究時，另一種可參考與使用的方法。

觀的詮釋與獨自分析造成的偏誤，也確保對於資料分析的客觀性（Jindra and Jindra 2003）。（2）客觀詮釋學對於文本概念的擴展與序列分析的分析過程，使得序列分析具有多領域的適用性，即便是對於異文化的田野調查，也都能夠在研究者進行資料蒐集之後，對於該資料進行序列分析。¹¹（3）客觀詮釋學認為個案的行動是受到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且透過分析個案，除了歸結出個案的行動模式外，也能推導出該文化或情境下的一般性行動邏輯，或以客觀詮釋學的用詞「個案概化與一般性推論」，即從對於個案的分析，推論出社會文化的結構（Oevermann 1983: 234）。對個案進行分析，然後基於從個案分析出的一般性規則，再推論到其他的個案，但在此之前，透過文本分析萃取出一般性規則，是進行序列分析所要達成的初步目標。¹²

除了學術研究方面的貢獻外，序列分析的使用還具有研究與教學並進的特長。在臺灣，研究執行過程似乎較常是研究者獨自對材料（訪談稿、觀察筆記）進行分析、思考受訪者的陳述內容與研究本身以及理論的關聯。而序列分析要求以團體進行分析，除了是依據本文談到的客觀詮釋學的方法論基礎外，將材料帶至分析團體與所有成員一起分析，有助於成員對於探索議題的討論，不但比個人獨自分析更仔細，甚至可能觸及研究者本身未預期到的議題。同時，在序列分析原則的規範下進行一次團體分析後，已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研究成果。這讓研究者在團體分析的過程中即能掌握到研究對象，而不致陷入面對資料的無助之中，有助於研究者快速掌握新的社會現象。讓學生加入分析團體一同進

11 實際的研究請參閱 Oevermann（2008），在該研究中，Oevermann 討論了客觀詮釋學對於分析異文化現象的理論基礎，其中包含文本的翻譯，與研究者認識該異文化程度多寡在方法論上的問題。

12 相關的研究可參閱 Allert（2010）對於納粹德國時期希特勒問候禮（hitlergruß）的考察，他從蒐集到有關該問候禮的歷史資料中，描述該問候禮如何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互動，更進一步造就德國人漠不關心的態度。也可同時參閱 Loer（2007）對於此書的評論。

行分析，除了能夠現場學習質性研究分析方法外，也有助於帶領與教導學生掌握該社會現象應聚焦的議題（Heeg et al. 2021）。

作者簡介

陳登翔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博士，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助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華人移民與跨國宗教、傳播科技與人際關係。目前主要關注臺灣宗教團體在跨宗教交流過程中的信徒動員，包含宗教義理內容與論述、領導者卡里斯瑪、組織文化、信徒的信仰認同等，各要素間的運作與影響。本文嘗試說明客觀詮釋學以團體進行分析的理論基礎與執行序列分析的實際狀況，並試圖指出其方法在質性研究材料上的應用，以及對於社會學研究可能帶來的啟發。

參考書目

- 江珮慈，2014，《審美的社會構成：具有藝術教育背景者觀畫邏輯的研究》。花蓮：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 邱秋雲，2008，《臺灣華人的死亡概念：客觀詮釋學分析》。臺北：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徐宗國，2008，〈紮根理論研究法：淵源、原則、技術與涵義〉。頁 37-60，收錄於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
- 黃聖哲，2010，〈美術館導覽的自我搬演〉。《文化研究月報》110: 25-42。
- 黃聖哲，2016，〈危機與宗教性：論 Oevermann 的宗教社會學〉。《臺灣社會學刊》59: 187-218。
- 黃聖哲，2018，《結構詮釋學》。臺北：唐山。
- 黃聖哲，2023，《危機與事件：論社會理論的若干基本問題》。臺北：唐山。
- 溫士朋，2021，《升學結構下的技職教育：以臺北市立大安高工為例》。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藍佩嘉，2015，〈質性個案研究：紮根理論與延伸個案法〉。頁 63-95，收錄於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
- Allert, Tilman, 2002, "Objektive Hermeneutik und fallrekonstruktive Forschung - Potentiale der soziologischen Perspektive für die klinische Forschung." Pp. 103-118 in *Qualitative Gesundheits- und Pflegeforschung*, edited by Doris Schaeffer and Gabriele Müller-Mundt. Bern: Huber.
- Allert, Tilman, 2010, *Der deutsche Gruß: Geschichte einer unheilvollen Geste*. Stuttgart: Reclam.
- Allert, Tilman, Bettina Dausienm, Günter Mey, Jo Reichertz and Gerhard Riemann, 2014, "Forschungswerkstätten – Programme, Potenziale, Probleme, Perspektiven." Pp. 291-316 in *Qualitative Forschung: Analysen und Diskussionen – 10 Jahre Berliner Methodentreffen*, edited by Günter Mey and Katja Mruck. Wiesbaden: Springer.

- Becker-Lenz, Roland, Andreas Franzmann, Axel Jansen and Matthias Jung, eds., 2016, *Die Methodenschule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Wiesbaden: Springer VS.
- Flick, Uwe, 2014,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 Flick, Uwe 著、李政賢等譯，2007，〈質性研究導論〉。臺北：五南。
(Flick, Uwe,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 Franzmann, Andreas, 2022, "The Method of sequence analys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bjective Hermeneutics – Origins and exemplification." *Gesprächsforschung – Online-Zeitschrift zur verbalen Interaktion* 23: 167-189.
- Franzmann, Andreas, Marianne Rychner, Claudia Scheid, Johannes Twardella, eds., 2023, *Objektive Hermeneutik. Handbuch zur Methodik in ihren Anwendungsfeldern*. Opladen, Toronto: Barbara Budrich.
- Gärtner, Christel and Zehra Ergi, 2012, "The Relation of Religious Identity and National Heritage among Young Muslims in Germany." Pp. 73-90 in *Religious Identity and National Heritage: Empirical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Francis-Vincent Anthony and Hans-Georg Ziebertz. Leiden: Brill.
- Gärtner, Christel, 2018, "Change in religious conduct of life within the dynamics of generational transfer." Pp. 337-351 in *Religion im Kontext / Religion in Context. Handbuch für Wissenschaft und Studium*, edited by Annette Schnabel, Melanie Reddig and Heidemarie Winkel. Baden-Baden: Nomos.
- Gärtner, Christel, 2019, "Religious Change as a Challenge: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Religion."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 27(2): 268-295.
- Gärtner, Christel, 2022, "Secularity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A specific features of non-religiosity and secularized worldview in a family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Religions* 13(6): 1-13.
- Garz, Detlef and Uwe Raven, 2015, *Theorie der Lebenspraxis*. Wiesbaden: Springer VS.

- Garz, Detlef and Uwe Raven, 2017, "Objektive Hermeneutik als rekonstruktive Forschungsmethodik in den Sozial- und Verhaltenswissenschaften." Pp. 1-25 in *Handbuch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der Psychologie*, edited by Günter Mey and Katja Mruck. Wiesbaden: Springer.
- Garz, Detlef, 2007, "Olga Lang-Wittfogel - eine objektiv-hermeneutische Biographieanalyse." *Zeitschrift für Qualitative Forschung* 8(2): 207-224.
- Geulen, Dieter, 1982, "Soziales Handeln und Perspektivenübernahme." Pp. 24-72 in *Perspektivenübernahme und Soziales Handeln*, edited by Dieter Geulen. Frankfurt: Suhrkamp.
- Habermas, Jürgen,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and 2. Frankfurt: Suhrkamp.
- Heeg, Rahel, Olivier Steiner and Magdalene Schmid, 2021, "Interaktionsdynamiken in einer partizipativen Auswertungsgruppe: kritische Reflexionen zum Status von lebensweltlichem Erfahrungswissen in einer Gruppenauswertung von Wissenschaftler*innen und Jugendlichen."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2(2): Art. 20.
- Jansen, Axel, 2006, "Die Objektive Hermeneutik als Instrument der historischen Fallrekonstruktion. Analyse eines Briefes von Anne Morgan." *Traverse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 Revue d'histoire* 2: 43-56.
- Jindra, Ines W. and Michael Jindra, 2003, "Structural ("Objective") Hermeneu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4: 253-275.
- Kieserling, André, 1999, *Kommunikation unter Anwesenden: Studien über Interaktionssysteme*. Frankfurt: Suhrkamp.
- Kleemann, Frank, Uwe Krähnke and Ingo Matuschek, 2009, *Interpretative Sozialforschung*. Wiesbaden: VS.
- Ley, Thomas, 2010, *Einführung in die Methode der objektiv-hermeneutischen Sequenzanalyse*. Frankfurt: Verlag für Polizeiwissenschaft.
- Loer, Thomas, 2007, "Tilman Allert: Der deutsche Gruß. Geschichte einer

- unheilvollen Geste." *Sozialer Sinn* 8(2): 408-412.
- Loer, Thomas, 2010, "Videoaufzeichnungen in der interpretativen Sozialforschung." *Sozialer Sinn* 11(2): 319-352.
- Loer, Thomas, 2021, *Interviews analysieren: Eine Einführung am Beispiel von Forschungsgesprächen mit Hundehaltern*. Wiesbaden: Springer VS.
- Luhmann, Niklas, 1984, *Soziale System*. Frankfurt: Suhrkamp.
- Maiwald, Kai-Olaf, 2005, "Competence and Praxis: Sequential Analysis in German Sociology."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6(3).
- Maiwald, Kai-Olaf, 2018, "Familiale Interaktion, Objektbesetzung und Sozialstruktur: Zur Bedeutung der ödipalen Triade in der strukturalen Familiensoziologie." *WestEnd-Neu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5(2): 73-85.
- Maiwald, Kai-Olaf and Inken Sürig, 2018, *Mikrosoziologie*. Wiesbaden: Springer VS.
- Mead, George H., 1962[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evermann, Ulrich and Martina Leber, 1994, "Möglichkeiten der Therapieverlaufsanalyse in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Eine exemplarische Analyse der ersten Minuten einer Fokalthherapie aus der Ulmer Textbank ‚Der Student‘." Pp. 383-427 in *Die Welt als Text. Theorie, Kritik und Praxis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edited by Detlef Garz and Klaus Krammer. Frankfurt: Suhrkamp.
- Oevermann, Ulrich, 1981, "Fallrekonstruktion und Strukturgeneralisierung. Frankfurt/M." Download at: <http://www.rz.uni-frankfurt.de/~hermeneu>. (Date visited: March 21, 2025).
- Oevermann, Ulrich, 1983, "Zur Sache, Die Bedeutung von Adornos methodologischem Selbstverständnis für die Begründung einer materialen soziologischen Strukturanalyse." Pp. 234-289 in *Adorno-Konferenz 1983*, edited by Ludwig von Friedeburg, Jürgen Habermas. Frankfurt: Suhrkamp.
- Oevermann, Ulrich, 1995, "Ein Modell der Struktur von Religiosität." Pp.

- 27-102 in *Biographie und Religion*, edited by Monika Wohlrab-Sahr.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 Oevermann, Ulrich, 1996, "Beckett's 'Endspiel' als Prüfstein hermeneutischer Methodologie. Ein objektiv-hermeneutisches Exerzitium." Pp. 93-249 in *Neue Versuche, Becketts 'Endspiel' zu verstehen.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Interpretieren nach Adorno*, edited by Hans-Dieter Köni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Oevermann, Ulrich, 1999, "Strukturelle Soziologie und Rekonstruktionsmethodologie." Pp. 72-84 in *Ansichten der Gesellschaft*, edited by Wolfgang Glatzer. Opladen: Leske+Burdich.
- Oevermann, Ulrich, 2000, "Die Methode der Fallrekonstruktion in der Grundlagenforschung sowie der klinischen und pädagogischen Praxis." Pp. 58-156 in *Die Fallrekonstruktion*, edited by Klaus Krämer. Frankfurt: Suhrkamp.
- Oevermann, Ulrich, 2002, "Klinische Soziologie auf der Basis der Methodologie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 Manifest der objektiv hermeneut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Das Institut für hermeneutische Sozial- und Kulturforschung*, https://www.ihsk.de/publikationen/Ulrich_Oevermann-Manifest_der_objektiv_hermeneutischen_Sozialforschung.pdf (Date visited: June 17, 2024).
- Oevermann, Ulrich, 2008, "Zur Differenz von praktischen und methodischem Verstehen in der ethnologischen Feldforschung." Pp. 145-233 in *Forschung unter Bedingungen kultureller Fremdheit*, edited by Gabriele Cappai. Wiesbaden: VS Verlag.
- Oevermann, Ulrich, Erwin Leidinger, Andreas Simm, Thomas Störmer and Jörg Tykwer, 1994, "Kriminalistische Datenerschließung. Abschlußbericht zum Forschungsprojekt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der tatsächlichen Abläufe im Kriminalpolizeilichen Meldedienst und der an der Zusammenführung beteiligten kriminalistischen Schlußprozesse -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Stellenwertes der EDV'." Pp. 121-308 in *Kriminalistische Datenerschließung. Zur Reform des Kriminalpolizeilichen Meldedienstes. Mit einem Beitrag von Harald Dern und dem Abschlußbericht der Fachkommission*

- Kriminalpolizeilicher Meldedienst. (BKA-Forschungsreihe, Sonderband)*, edited by Bundeskriminalamt. Wiesbaden: Bundeskriminalamt.
- Oevermann, Ulrich, Tilman Allert, Elisabeth Konau and Jürgen Krambeck, 1979, "Die Methodologie ein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Pp. 352-434 in *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 und Textwissenschaften*, edited by Hans-Georg Soeffner. Stuttgart: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 Oevermann, Ulrich, Tilman Allert, Helga Gripp-Hagelstange, Elisabeth Konau, Jürgen Krambeck, Erna Schröder-Caesar, Yvonne Schütze, 1976, "Beobachtungen zur Struktur der sozialisatorischen Interaktion. Theoretische und methodologische Fragen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 Pp. 274-195 in *Zwischenbilanz in der Soziologie*, edited by M. Rainer Lepsius.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 Parsons, Talcott, 1962,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Pollmanns, Marion, 2023, "Unterrichtliche Notizen von Schülern." Pp. 197-223 in *Objektive Hermeneutik. Handbuch zur Methodik in ihren Anwendungsfeldern*, edited by Andreas Franzmann, Marianne Rychner, Claudia Scheid, Johannes Twardella. Opladen, Toronto: Barbara Budrich.
- Reichertz, Jo, 2010, "Objective Hermeneutics and Hermeneutic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p. 290-295 in *A Compan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Uwe Flick, Ernst von Kardoff and Ines Steinke, Bryan Jenner trans. London: Sage.
- Reichertz, Jo, 2013, *Gemeinsam interpretieren: Die Gruppeninterpretation als kommunikativer Prozess*. Wiesbaden: Springer VS.
- Schmidtke, Oliver, 2008, "Soziologische Architekturinterpretation mit Hilfe der Methode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 Exemplarische Gebäudeanalyse des Wohnhauses für F. C. Robie des Architekten Frank Lloyd Wright 1908 in Chicago, USA." *Wolkenkuckucksheim.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zur Theorie der Architektur* 12(2). ISSN:

1430-8363.

- Schumann, Svantje, 2019, "Inhaltsanalyse und Objektive Hermeneutik: Zur Analyse der Bedeutung sozialer Interaktion für Bildungsprozesse." *Sozialer Sinn* 20(1): 153-195.
- Twardella, Johannes, 2016, "Objektive Hermeneutik in der Unterrichtsforschung." Pp. 159-177 in *Die Methodenschule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edited by Roland Becker-Lenz, Andreas Franzmann, Axel Jansen and Matthias J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Weber, Max, 2005,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Zweitausendeins.
- Wernet, Andreas, 2009,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pretationstechnik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3 edition*. Wiesbaden: Springer VS.
- Wernet, Andreas, 2014, "Hermeneutics and Objective Hermeneutics." Pp. 234-346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edited by Uwe Flick. London: Sage.
- Wiener Carolyn, 2007, "Making Teams Work in Conducting Grounded Theory." Pp. 293-311 in *The SAGE Handbook on Grounded Theory*, edited by Antony Bryant and Kathy Charmaz. London: Sage.
- Wohlrab-Sahr, Monika, 1999a, "Lösung eines deutschen Dilemmas: Soziokulturelle Widersprüche und die biographische Entstehung von Religiosität." Pp. 43-68 in *Die Kunst des Auslegens: zur Hermeneutik des Christentums in der Kultur der Gegenwart*, edited by Reiner Anselm, Stephan Schleissing, Klaus Tanner. Frankfurt/Main: Peter Lang.
- Wohlrab-Sahr, Monika, 1999b, "Conversion to Islam between Syncretism and Symbolic Battle." *Social compass* 46(3): 351-362.
- Wohlrab-Sahr, Monika, 1999c, *Konversion zum Islam in Deutschland und den USA*. Frankfurt/Main: Campus.